

“存活论”的基本要义及其学术贡献

文 / 古风

《美与时代》2015年第1期

20世纪，我国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“西化”浪潮，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地被边缘化了，但却没有消亡，而是还“存活”着。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。“存活论”告诉人们，中国传统文论的文脉没有中断，它以顽强的生命力“存活”着，并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，参与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建设。所以，中国文论的“现代化”应该包括两个方面，即“洋化”和“本土化”。

20世纪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世纪，其主要标志就是从外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文论话语，并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知识谱系。所以说，20世纪是我国大量引进外国文论的世纪，也是西方文论主宰中国文坛的世纪。那么，中国传统文论是否就消亡了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笔者经过数年的细致调查和潜心研究，提出了“存活论”的新理论。笔者认为，20世纪，我国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“西化”浪潮，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地被边缘化了，但却没有消亡，而是还“存活”着。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。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“存活论”的基本要义及其学术贡献。

一、发掘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“存活”的文艺学现象

100多年以来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，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论也必然要现代化。中国“现代化”的实质即是“西化”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“现代化”不是通过本土文化的内部调节来进行，而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方式进行的。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现代化也是如此。从“五四”时期的白话文运动，到各个时期大量地引进日本、俄苏和欧美的文学理论等，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，20世纪共引进外国文论话语533个，其中常用文论话语有162个。因此，20世纪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世纪。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，就是从外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文论话语，而且这些外来的文论话

语成为主流话语，并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知识谱系。所以，在一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中，我们似乎只是听到了这些外来文论话语的声音，而听不到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声音，难道它们都消亡了吗？

事实上，学界也普遍认为，中国现代文论使用的是外来话语，传统文论话语基本上没有进入现代文论体系，也就是说消亡了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，因而提出了“存活”的新概念。所谓“存活”，主要是指古代文论的一些传统话语并没有消亡，而是被“隐性传承”了下来，以及在现当代文论和批评中的使用情况。我们认为，确实有一些古代文论话语并没有消亡，还仍然存活在现当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之中。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。不过在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，人们对于这一事实有所忽视，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盲区。因此，我们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“存活”的文艺学现象，并予以研究。

通过调查研究，我们发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始终伴随着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矛盾和冲突。诸如“五四”时期的“打倒”传统、“文革”时期的“批判”传统和新时期的“反思”传统等。因此，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疏远传统、搁置传统甚至抛弃传统为沉重代价而进行的。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，即认为中国现代文论是利用外来文论资源、尤其是利用西方文论资源建构起来的。这样就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在。我们认为，虽然“传统”成为“现代化”运动的对立面和被否定的对象，但是却始终能够看到它的影子。就是说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被边缘化了，但是却并没有消亡。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情形也是如此，它们也没有消亡，而是还“存活”着。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：一是目前大约有 134 个传统文论话语还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之中；二是这些存活着的传统文论话语大致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，即本体论话语系列有 26 个，创作论话语系列有 26 个，文体论话语系列有 9 个，修辞论话语系列有 16 个，风格论话语系列有 22 个，鉴赏论话语系列有 35 个；三是从这些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能力的大小来看，最具有活力的话语有两个，一个是“意象”，使用率为 8 次；一个是“意境”，使用率为 7 次。最具有活力的话语系列也有两个，一个是本体论话语系列，使用率在 4 次以上（含 4 次）者有 7 个；一个是风格论话语系列，使用率在 4 次以上（含 4 次）者有 4 个。存活力较差的是文体论话语系列，使用率在 3 次以上（含 3 次）者为“0”。四是目前存活在现代文论里的传统文论话语中，常用文论话语有 56

个。这些话语主要是围绕着“诗”、“文”等正统文学所展开的，真正是属于“诗文评”的理论话语。这与我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状况是十分吻合的。

总之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“存活”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，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。我们将这个文艺学现象发掘出来，就既是一个新的发现，也是对于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。

二、揭示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“存活”的具体路径

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是通过以下几个路径“存活”下来的。

1、它们存活在汉字文献之中。近百年来，我们虽然经历了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、从繁体汉字到简体汉字的变通和转型，但是汉语和汉字的本质没有变。这样以来，就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“存活”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和保障。

2、它们存活在高等教育之中。这主要体现在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”、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”、“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史”、“中国古代诗学”、“中西比较诗学”、“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”、“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与批评”等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的教学；也体现在“文学概论”（或“文学原理”）、“文学批评原理”和“文艺美学”等一系列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。通过教学，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深入人心，获得了传承和再生的机会。

3、它们存活在学术研究之中。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，出现过三个高潮：即1920至1930年代，随着高校教学的需要，出现了“中国文学批评史”的研究热潮，陈钟凡、郭绍虞、罗根泽、朱东润、方孝岳、傅庚生等都有著作出版；1960年代，为了摆脱“苏联影响”，在周扬主持下统一编写文科教材。周扬说，编写教材时，不仅要“一手伸向外国”，还要“一手伸向古代”，要整理我们的“理论遗产”，要总结“中国文学的经验”，要发展“中国的文艺学”。这个时期，先后出版了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（四卷本）和“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”等，带动了古代文论研究；在19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，古代文论研究达到了高潮，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如汗牛充栋，多得难以统计。这些研究不仅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传承了下来，而且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直接带进了现代文论和批评之中。

4、它们存活在外国文论的翻译之中。在用汉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时，实际上是将外国文论话语转换成汉语文论话语。翻译的过程就是中（汉语）外文论的

对话过程。大致说来，主要有三种类型：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论中已有的话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。诸如“诗”（poem）、“散文”（prose）、“小说”（novel）、“形象”（image）、“意象”（imagery）等。二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找不到“对等”的话语，而运用其他中国古典文献话语来翻译外国文论话语。诸如：“文学”（literature）、“风格”（style）、“情感”（emotion）、“想象”（imagination）、“典型”（typical case）等。这些古代话语虽然不是文学话语，但是通过翻译（意译）外国文论便存活了下来，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常用话语。三是根据汉语构词法规律，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成一个新词，用来翻译（意译）外国文论话语。诸如：“纯文学”（belles lettres）、“灵感”（inspiration）、“现实主义”（realism）、“浪漫主义”（romanticism）、“意识形态”（ideology）等。这些外国文论话语已经“中国化”了，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要话语。

5、它们存活在古今转换之中。中国历代文论家既重视对于传统文论话语的继承，又重视创新和发展。所以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才能够穿越数千年的茫茫历史烟云而存活至今。诸如：“诗”、“文”、“情”、“景”、“言志”、“传神”、“意境”、“神韵”、“境界”、“比兴”、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等中国传统文论话语，就是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的，至今还存活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。

6、它们存活在当代学者的运用之中。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之所以是“话语”，就因为它们在现当代的文学对话中没有退场，没有失效，仍然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。如蓝华增运用“意象”、“意境”、“有我之境”、“无我之境”等意境系列话语，评论云南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歌作品。又如港台学者黄维樑用《文心雕龙》的“位体”、“事义”、“置辞”、“宫商”、“奇正”、“通变”等“六观”话语评析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《骨灰》。因此，判断一个传统的文论话语还有无生命力，关键是要看其后人是否在使用它。如果使用，它就能够存活，它的生命就能够得以延续。

三、概括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“存活”的基本规律

中国传统文论话语采取了“隐性传承”的方式存活了下来。从表面看来，“传统”好像不复存在；其实，从深层来看，“传统”并没有远去，而就在我们身旁。不过它采用了极其“隐蔽”的存活方式。中国传统文论绵延数千年，至今魅力不衰，奥秘就在于此。

学界有人认为，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是“单线”发展，即与传统文论没有关系，或者甚至与传统文论断绝了关系；只是在不断引进外国文论，并按照外国文论的模式在建构和发展。我们认为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。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是“双线”发展，即一条是利用外国文论资源、参照外国文论模式的发展；一条是利用传统文论资源、延续传统文论文脉的发展。前者是主线，是明线；后者是辅线，是暗线；前者是走着“洋化”（包括欧化、苏化和西化）的道路，后者是坚守着“本土化”的道路。所以，“存活论”告诉人们，中国传统文论的文脉没有中断，它以顽强的生命力“存活”着，并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，参与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建设。中国文论的“现代化”应该包括两个方面，即“洋化”和“本土化”。有些人将中国文学理论的“现代化”仅仅等同于“西化”，这是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因为，近百年来，关于我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，无论怎样表述，是“中体西用”也好，是“西体中用”也好，还是“中西互补”也好，都包括了“中”和“西”两个方面，而不是只有“西”一个方面。当然，提倡“全盘西化论”者大有人在，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国人的质疑、批判和排斥。事实上，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没有选择“全盘西化”的道路，而是一直走着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现代化道路。所以，中国文学理论“现代化”的发展也是如此。

作者简介：古风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